

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及劳资关系处理

张小坡

(1.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2.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主要分布在茶叶的生产地徽州和销售地上海,徽州境内的茶商同业组织不断演变,并构筑起覆盖茶产地的组织网络。上海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是茶商、茶栈工头、茶工的联合体,其中心事务是维护茶工福利和调解三方矛盾。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在成立初期实行董事制,其后改为委员制,突出民主决策,集体管理,强调对权力的监督制衡。1926年发生的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和茶工要求增加工资案是当时中国众多劳资纠纷中比较典型的案例,由于劳资双方均来自徽州,具有乡谊关系,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更多地依赖同业和同乡组织居中调处。

【关键词】徽州;茶商;同业组织;劳资纠纷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3-0086-11

Processing Business Leagues and Labor Relations in Modern Huizhou Tea Merchants

ZHANG Xiao-po

(1.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2.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modern Huizhou tea merchants business leagu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ea production of Huizhou and sales of Shanghai, Huizhou tea business leagues continued to evolve and built the main tea producing organization network. Shanghai Star River Dunzi Tang tea hall was combination of tea merchants, tea foremen, tea workers, which mainly revolved arou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ea workers and the three parties. The modern Huizhou tea merchants guild practi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ard in the early days, and then changed into the committee system, which emphasizing on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collective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limited power. The case of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r River Dunzi Tang tea hall and the case of demanding an increase in wages were typical cases of Chinese many labor disputes in 1926. Because both sides coming from Huizhou, when they were in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disputes, they more depended on the mediating of the same industry and the fellow townships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Keywords: Huizhou; tea merchant; business leagues; dispute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收稿日期】 2018-03-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徽州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研究”(16JJD770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14ZDB034)

【作者简介】 张小坡(1979-),男,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徽学。

同业组织是明清以来在同一区域经营的工商同业者的团体,被称为公所,亦有被称为会馆者^①。明清时期的徽商以经营人数之众、经营行业之广而闻名于世,为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徽商在徽州人聚集较多的地方牵头成立了以地缘关系为结合点的会馆。与数量可观的会馆相比,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徽商同业公所则为数甚少,主要是因为徽州同业商公所兼具同乡与同业的色彩,同一地区经营同一行业的徽商人数足够多,他们才会考虑成立面向同乡的同业公所。在绝大多数地方,徽商选择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同业者共同设立公所,而当地的徽州会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合徽商同行的作用。

商人联合设立同业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工商发展,开展同业救助,维护同行商业利益,增强市场竞争力,镇压工匠反抗等。由于现存史料的制约,我们对商业史的研究往往是从商人语境出发,而忽略了为商人所雇佣使用的人员。其实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抑或手工业作坊主,都离不开学徒、店员、工匠之类的伙计,特别是随着近代手工业、工业、商业的发展,工人/雇员与资方/雇主已成为中国社会网络中最为基本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劳资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张力。1920年代,中国各地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劳资纠纷问题愈演愈烈,各地工人为反对劳动条件恶化、工时延长、工资被克扣所发起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对于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徽州人来说,劳资关系更显复杂。徽州人长到十三四岁,如果不读书,就会考虑外出寻找生计,有家人或亲戚在外地经商者会直接带入店铺中,或者托熟悉的中间人介绍到同乡商号,从学徒做起,一路曲折上升或自谋发展。徽商与伙计来自同一个地方,往往掺杂着亲情或乡情关系,出现店铺经营人员乡土化的现象。胡适先生在口述自传中曾提及家乡人外出务工的情形:“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做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②近代开埠之后,上海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越来越多的徽州人聚集到上海经商、做工、求学等,其中墨作业、菜馆业、茶栈业等行业为徽州人所经营,雇佣的工人也多来自徽州,有数万之众。这些行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待遇低,所获薪金不足以维持生计。为争取最基本的权益,徽州工人先后发动数次抗争,对笼罩着亲情或乡情面纱的徽州劳资双方而言,如何解决纠纷颇费思量,值得后来者探讨。

① 学界对同业组织给予了一定关注,早在上世纪20年代,郑鸿笙就撰文考察了公所的性质、组织机构以及公会的性质、设立、事务和特别法等问题(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18日)。李森堡则对同业公会的渊源、组织制度、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森堡:《同业公会研究》,青年书店,1947年)。吴慧在《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中梳理了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轨迹。宋钻友的《从会馆、公所到同业行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朱英在《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同业公会虽属近代新型工商同业组织,但也保留着某些旧式行会的特色,突出表现在继续采取与行会类似的维护同业垄断利益的非常举措,对官府也同样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常常借助官府的权威达到保护本业和限制他业发展的目的。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认为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此外,魏文亨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回顾,并对未来研究取向作出展望,参见魏文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胡适英文口述稿,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章《故乡和家庭·徽州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本文使用报刊、档案资料,拟对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的演变进行梳理,考察其组织架构,重点分析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及制茶工人要求加资事件,以期了解旅外徽州人劳资纠纷的调解机制及其特征。

一、近代徽州茶商组织的演变及治理架构

徽州以茶为特产,“吾徽物产之丰富,首推茶叶一项,以其土脉厚而培制良,故内而推销全国,外而普遍重洋,莫不收誉以归,为世称重。”^①所产之茶除祁门红茶外,皆为绿茶,其中婺源茶的种植面积及产量居于徽州府首位,茶叶的品质亦最佳,绝大部分用来加工洋庄出口,在国内销售极少^②。徽州茶出口的历史较早,在18世纪以后广州一口通商时代,就南下外销。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逐渐取代广州的茶叶出口重镇地位,成为茶叶贸易中心,徽州茶因地利之便悉数转道上海,进入外贸的黄金期。清末民初的十余年内,设在屯溪的茶号有百余家,制茶数额最多时达21万余箱,按照当时通行的装箱重量,每箱以50斤计,则有10万余担。徽州茶大部分销往西欧各国,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

围绕茶叶的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徽州茶商在茶产地和出口地设立了同业组织。由于洋商借口货样不合或茶叶受潮而肆意压低价格,徽州茶商为减轻盘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在上海设立了茶栈,大量招收徽州茶工,进行茶叶改制,“当最初时期,茶叶出口,多先在产茶当地经烘制之手续,后出口茶商渐觉有在上海设厂制茶之必要,盖如此则制成之茶,比较的合于外人心理,利于推销也。此种尝试,不久即著成效,于是效尤者接踵而起,一时制茶者不下三四十家,谓之土庄茶栈。”^③徽州茶工又以婺源人为最多,1927年《申报》的一份报道就反映了这方面的信息:“婺邑素以产茶、制茶著称,故凡有制茶号均须婺茶司指导。沪上土庄茶栈出店,婺人尤夥,俨然自成专业。前岁土庄最盛之时,婺茶工在沪人数不下四五千人。”^④为联乡情睦乡谊,咸丰元年(1851),婺源旅沪制茶工头筹募资金设立了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公所成立之初,发展颇为曲折,房屋屡屡被同乡盗卖。光绪八年(1882),新盛恒栈主董万林、许攸等人邀集在沪婺源茶商捐资购地,在城内花草浜重立敦梓堂,命名为星江公所,公举董事办理堂务,并将多余房屋出赁以收取租金,另向茶栈征收炒茶锅捐以弥补经费的不足。在众人的努力下,星江公所获得经费保障,规模初具。公所董事为了避免重蹈以往屡兴屡败的命运,于光绪十一年(1885)稟请上海县署及公廨立案,严禁盗卖并勒石公布^⑤。1929年6月11日,星江茶业公所在上海市社会局申请备案。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激战数月后,上海沦陷,星江茶业公所平静的发展进程被打破,公所各负责人与婺源同乡先后返回故土避难,堂务陷入停顿。1945年抗战胜利后,婺源同乡及公所负责人陆续回到上海,婺源茶商朱占鳌等人度整理堂务,并会同公所原有负责人发起恢复星江敦梓堂组织,举办各种善举,使同乡无失屏障^⑥。

徽州境内设立茶商同业组织的时间稍晚。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刘坤一鉴于屯溪为皖南茶市中心,饬令组织茶商团体以负责茶业的调查、统计等事宜,茶商洪其相、李荔轩等人奉命发起屯溪

① 上海程裕新号赠品《茶叶分类品目说明书·序言》,此份材料复印件承《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张朝胜老师惠赐,谨致谢忱。

② 朱美予编著:《中国茶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60页;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上海大文印刷所,1934年,第3页。

③ 《上海茶栈事业之调查》,《商业月报》第14卷第2号,1934年。

④ 《制茶工人大批赴沪》,《申报》1927年6月27日。

⑤ 《星江敦梓堂征信录·星江茶业公所敦梓堂略历》,民国十五年刊,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850-851页。

⑥ 《星江敦梓堂》,Q6-9-85,上海市档案馆藏。■

茶业公所,常年经费从出口箱茶每引抽捐 3 分充之。光绪二十四年,祁门茶商创立祁门茶业公所。宣统年间,婺源茶业公所和歙县茶业公所相继成立。民国元年,茶商吴永柏、俞燮等认为屯溪为徽茶总汇之区,婺源、歙县、祁门等地已有茶商分会之设,便将屯溪茶业公所改组为徽州茶务总会,并设分会于婺源、歙县、祁门三处。1931 年,依照“中华民国工商同业公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徽州茶务总会被改组为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事务所仍设在屯溪,从出口箱茶每箱抽取 2 分作为常年经费,洪朗霄被推选为主席,1933 年改选汪秋圃为主席^①。歙县茶业公所亦于 1931 年被改组为歙县茶业同业公会,设于城内三脚牌楼,主席为洪敬时,公会成立之初,影响力非常有限,办事范围仅辐射到渔梁,深渡等地茶商发生纠纷时,仍由商会出面解决^②。1932 年,祁门茶业公所改组为祁门县茶业同业公会,设在县城内,会员以茶号为单位,1934 年,会员扩充到 198 名^③。

在治理架构上,屯溪茶业公所和徽州茶务总会均采用董事制,组成人员分为普通会员、会董、总理和协理 3 类。普通会员无定额,无任期要求,由屯溪各茶栈、茶号经理担任,享有选举会董及被选为会董、总理、协理权以及条陈请议权、旁听会议权。会董由普通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享有选举总理、协理及被选为总理、协理权以及会议表决权、调查茶务权。总理、协理由会董投票选举产生,若人员从会董中选出,所缺会董名额从选举会董时得票次多者补选。总理得到协理的同意,可聘请坐办及任用书记、会计、司员,享有执行议决事务之权和管理财政之权。协理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总理执行议决事务、管理财政及总理有事缺席时代理其职务,在征得总理同意后,也可聘请坐办及任用书记、会计、司员。会董及总理、协理任期均以 1 年为限,任满改选时仍被选举者可以连任,但不得连任 3 次^④。

1912 年 2 月 10 日,徽州茶务总会在屯溪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人员投票选举汪锡爵、孙熙义、程崇烈等 14 人为会董,新当选会董投票选举吴永栢为总理,汪智炜、李应庚为协理。继而由总理、协理聘请事务所坐办、书记、会计、司走、司厨、驻沪办事员、书记兼翻译等各 1 人。从徽州茶务总会简章可知,该会宗旨是设法整顿推广徽州茶业,负有帮办或承办徽州茶税的义务以及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茶务咨询随时答复呈报的义务。总会与各分会互通声气,及时沟通茶务利弊及各种事件。徽州茶务总会每年的会议分为 3 种,特会在农历二月、十二月召开,开会前半月由事务所刊发传单邀请参会人员;常会从农历四月至八月每星期日举行;临时会无定期,遇有特别事件需要议决时由总理、协理临时决定,先期发传单邀集。开特会时,全体普通会员均须参加,开常会时,参会的会董过半数即可,会议结束后,所有议决事件均由书记整理公布。徽州茶务总会的经费收入分为 2 类,一类为原屯溪茶业公所结余费用,另一类为屯溪各茶栈承担的公益捐。经费支出主要为事务所坐办、书记、会计、驻沪办事员等人员的薪水以及伙食、各项杂支。为管理经费,该会实行预算决算案,预算案征得全体会董过半数同意,于每年开第一次特会时议决施行,年终开第二次特会时,总理、协理将收支数目开列清单提请议决后作为决算案。每年收支结余钱款由总理、协理邀集会董共同决定存储生息。凡会内往来文牒及经费收支簿册由会计和书记保存登记,调查员者每月检查一次^⑤。

1931 年徽州茶务总会被改组为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时,其治理架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由董事制改为委员制,组成人员分为会员、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常务委员、主席。凡在休宁县境内开设茶号者均为该会会员,会员代表由茶号推选经理及年满 25 岁以上者 1 至 2 人充任,会员代表有表决权、建议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会员代表大会上用无记名连选法选举执行委员 15 人、候补执行委员 7

① 傅宏镇:《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 6 卷第 7 号,1934 年。

② 《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第 7 卷第 12 号,1936 年。

③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36 年,第 42—43 页。

④ 范和钧:《屯溪茶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第 9 卷第 4 号,1937 年。

⑤ 《徽州茶务总会成立纪事并会章》,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人、监察委员 7 人、候补监察委员 3 人,监察委员监督会内账目、产业及执行委员的办理事项。再由执行委员互选常务委员 5 人,然后从常务委员中选举 1 人为主席,全面负责会务。此外聘任文牍、书记、会计兼庶务、收捐员及帮办收捐员各 1 人办理公会日常事务。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的宗旨是维护同业利益,处理同业纠纷,发展对外贸易,办理事项如下:“筹议本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本业利害关系,建议于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事项;关于本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关于业务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本业之统计之调查编纂事项;得设茶业学校但须呈报主管官署核准。”^① 同业公会比较重要的会议有,会员大会每年开会 1 次,在新茶上市时举行;执行委员会每月 1 次,在月末召开;常务委员会每月 3 次,分别于 1 日、11 日、21 日召开,如遇到特别事情,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议。会员大会的决议要有会员代表过半数出席,出席代表的过半数同意才能实行,如果出席代表不过半数,决议暂时搁置,将其结果通告各代表,在两星期内重新召集会员大会,对决议进行表决,得到出席代表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②。

祁门县茶业同业公会也采用委员制,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 39 人,再由执行委员互选常务委员 7 人,最后从常务委员中选举出主席,综理会务。又设监察委员 11 人,亦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监察会产及一切会务。同业公会的职责为对外代表茶商交涉问题,转达上海商情,调解同业争执等事务,对茶叶的加工、运销等事项则无暇顾及,只是在茶季前召开会议一次,并翻印农商部奖状发给各茶号。同业公会的经费收入按茶叶数额抽取,出口红茶每箱 4 分,其他各色茶叶每百斤 8 分,每年经费有千余元^③。

上海星江茶业公所敦梓堂初期实行董事会制,后改为执监委员会制,1935 年改组为理监事委员会制。1926 年,敦梓堂议决,由全体作头公举总董 1 人、议董 2 人,总董由全体作头大会公举殷实商家担任,议董则由全体作头互相推举,结果选出总董胡靖响,议董叶际康、程润庭。总董有保管财产、处理堂务之权,负责办理公所内外事宜,未经全体作头大会通过,不得自由交卸职权。议董协助总董处理堂内一切事务。敦梓堂遇有事故,由总董办理,特别事故由司事报告总董,召集全体大会公决。每年二月初十起至十四日止,议董派人入堂,清理全年账目,并于十五日召开全体大会,恭读朱文公诞辰祝文,公开核算全年账目,当晚设筵庆贺,不是作头以及未代收火锅捐者不得入席^④。

1947 年,星江敦梓堂章程规定,由全体会员组织会员大会作为敦梓堂的最高权力机关,开会时以会员十分之六以上出席者为法定人数,会员大会议决预算、决算及其他重要事项。会员资格有一定要求,“凡婺源旅沪制茶领班人员品行端正,表同情于本堂者,经会员二人介绍,缴纳常年会费,皆得为本堂会员(会费以会员之工作栈内制茶机器多寡计算,每部每年征收法币二万元,如无任职者,得免缴费)。”凡会员有不轨行为或违反敦梓堂规则者,经监事委员会审查属实,提交会员大会取消其会员资格。会员的权利一律平等,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会员的义务则是推动敦梓堂事业的进行,并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敦梓堂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 7 人、候补理事 2 人组成理事委员会,并互推理事长 1 人综揽一切事务,在大会休会期间,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堂内外事务。会员大会选举监事 3 人、候补监事 1 人,组成监事委员会,互推常务监事 1 人,主持会务并监督帐册收支是否清晰完整,会员是否良莠不齐,理事委员会办事有无弊端等。选举理事、监事时,用记名投票法,以得票数最多者当选,其次为

①《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章程》,此份材料复印件承歙县党史地志办公室主任邵宝振惠赐,谨致谢忱。

②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安徽省歙县、休宁),1936 年,第 47 页。

③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36 年,第 42-43 页;《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祁门县茶业调查报告(续)》,《建设周刊》1933 年第 51 期第 4 页。

④《星江敦梓堂征信录·星江敦梓堂条规》,民国十五年刊,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853 页。■

候补。理事委员会设有总务股、公益股、仲裁股、调查股、经济股等 5 股,各股干事从理事委员中推出,属于义务性质,不支薪水。监事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有:“(一)督促本堂事务之进行。(二)稽核本堂财产及出纳款项。(三)审核本堂预算及决算事项。(四)提交议案及审查理事委员会提交复决事项。(五)发现理事委员会办理事务有欠,当时得具书面纠正之,如有弊端时,得提出弹劾之。”^①

我们从 1948 年敦梓堂在呈报给上海市社会局的“公益慈善团体重要职员登记表”中能够看出公堂主要职员的身份信息:

姓名	年龄	籍贯	职业	略历	现任团体职务	住址
朱占鳌	36	安徽婺源	茶商	占升昌茶厂经理、裕升永茶厂厂长、公升制茶厂襄理	星江敦梓堂理事长	长乐路西三五四巷一号
伊春发	41	同上	茶商	义泰丰制茶厂经理	常务监事	河南北路鹏程里十六号
叶养和	40	同上	茶业	义泰丰制茶厂领班	理事	河南北路鹏程里十六号
戴福报	50	同上	茶业	同孚制茶厂领班	理事	安庆路志铨里十九号
刘广炎	47	同上	茶业	振裕制茶厂领班	理事	七浦路彩和里一二九号
金祥海	53	同上	茶业	德昌祥制茶厂领班	理事	七浦路六零二号
刘格言	61	同上	茶业	中信局制茶厂领班	理事	海宁路福寿里四一号
程福生	41	同上	茶业	源利制茶厂领班	候补理事	北浙江路七七号
汪培楠	41	同上	茶业	汪裕泰制茶厂领班	候补理事	金陵路西一九七号
汪培铨	47	同上	茶业	三元制茶厂领班	候补理事	河南北路图南里十八号
程子云	59	同上	茶商	办理本堂业务 22 年之久	事务员	桃源路秉安里二十三号

资料来源:《星江敦梓堂》,Q6-9-85,上海市档案馆藏。

从上表可以看到,星江敦梓堂的重要职员为茶商和茶厂领班,也就是作头,敦梓堂视为茶商与从业伙计的一个联合体,茶厂领班即为伙计的代言人。1926 年的章程已明确交代了栈主、作头与茶工之间的关系,“各栈作头与栈主本为唇齿之相依,设有困难问题,得报告本堂予以公正处理,而各栈人工均归作头雇用,任免等事,作头自有相当权衡。”^②

敦梓堂所办事务主要围绕茶工福利展开,大致分为施粥、施药、救济等 3 项,“每年从二月初一日起至四月月初一日止,设立粥局,凡茶栈工人每日均可入局食粥;每年夏季购办痧药散给各栈工人,以防疾病;每年除夕,散给茶栈工人度岁费用每人钱五百文。”^③ 1947 年敦梓堂应办事务除了上述 3 项外,增加了调解茶业栈主、工头、工友之间的纠纷,资助制茶工人死后殓费兼办施棺、盘柩回籍等事务 2 项^④。可见敦梓堂把原本应由茶商承担的责任包揽过来,对制茶工人的生老病死予以照顾,不仅解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也减轻了茶商的经济负担。

二、1926 年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徽州茶商同业公会采用了现代党团选举法、任期法的组织形式,内部分工

①《星江敦梓堂·星江敦梓堂章程》,Q6-9-85,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星江敦梓堂征信录·星江敦梓堂条规》,民国十五年刊,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853 页。

③《星江敦梓堂征信录·星江敦梓堂条规》,民国十五年刊,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853 页。

④《星江敦梓堂·星江敦梓堂章程》,Q6-9-85,上海市档案馆藏。

明确,权责清晰,突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并能根据社会形式的不断变化逐渐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以增强适应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徽州茶商同业组织的演变并非一帆风顺。1926年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就是在茶栈工人的极力争取下被迫进行的,其后,茶栈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进行了历时更久的抗争,这是1920年代中国劳资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旅外徽州人的生活状态。

1926年刊布的《星江敦梓堂征信录》对总董胡靖昀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辛苦经营,岁无虚事。但制茶工人对星江公所并不作如是看待。1926年5月14日,在上海的婺源籍制茶工人以公所设立历年已久,规章已不适用为由,在星江公所召集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工人代表洪万财、吴伯超、朱润斌、程灶海等100余人与会,认为公所管理弊端丛生,虽然公所每年收入颇丰,却一直被总董胡靖昀、司事汪子文所把持,数千茶工无权过问。有人提议将公所改组为委员制,以吸收大多数工人研究茶叶改良,谋全体茶工之幸福。众人一致赞同改组,并议决凡到会人员皆为会员,筹备改组事宜^①。

5月22日,敦梓堂星江公所召开第三次改组委员会会议,郑鉴源、洪光春、臧祥亨等30余人到会,郑鉴源被公推为会议主席。洪光春在发言中提出公所旧章确实与现时潮流不合,应公推起草员修改公所章程,由公正人员组织董事会,协助办理会务^②。郑鉴源在1920年前后来上海,经数年努力,创办了源丰润茶栈,专代各地茶商向上海洋行推销茶叶,赚取佣金,后开办源利茶厂,进行毛茶精制。臧祥亨等人则是茶栈作头。可见在星江敦梓堂改组问题上,茶工与部分栈主站在了一起,他们针对的是已掌握敦梓堂大权多年的胡靖昀、汪子文等人。汪子文等针锋相对地开始反击,5月24日,汪子文以星江茶业公所敦梓堂的名义在《申报》上发布通告,声明星江公所由茶商设立,与工人无关,不承认所谓的“小南门敦梓堂星江公所开第三次改组委员会”,提出:“查敝公所自本月初四日被少数工人开会演说,当场被警驱散后,至今并无开会情事。贵报所登,想系传闻失实,用特函请更正,以免讹传。”^③

5月24日,敦梓堂公所董事洪先春、臧祥亨及旅沪婺源绅商郑鉴源、汪禹丞等多人,在贵州路旅沪安徽自治协会聚议办法,形成了三条意见:(1)撤消司事汪子文职务,由董事暂时接管,所有交涉事宜委托李时蕊律师办理。(2)改组办法,由各栈工人推选评议员30人议决公所事务,评议员推选理事11人执行公所事务,再由理、评两会推选董事9人全权办理会务。(3)委托会计俞希稷清查汪子文经手的账目。三项议案由与会董事及各代表亲笔签名以示郑重^④。会后,臧祥亨、洪先春等人即将议决事项委托李时蕊律师依法交涉,李时蕊遂发函通告汪子文,但汪子文拒不执行。

茶工见汪子文态度强硬,数日后在《申报》上发出呼吁,提出四条意见:(1)星江茶业公所系茶业工人捐资设立的公共产业,不是茶商及管事司董的慈善机关,应请官厅及公众明确认定。(2)管理茶业公所的司董胡靖昀、汪子文损害公所利益,侵夺工人权利,应停止职务,听候官厅裁判。(3)公所组织及管理方应由工人代表开会议决,呈请官厅核准实行,在官厅核准办法尚未确定以前,请求官厅选派委员暂行接管。(4)公所整理完成后,应切实整顿同业行规,由公所发给同业工人执照,规定工作时间、工资数目及工人应享权利、应尽义务^⑤。

6月15日,婺源茶业工人代表在星江茶业公所内召集全体代表大会,讨论剔除公所积弊,修正公所章程及行规等事项。本次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的前一日,工人聘请的律师李时蕊就向淞沪警察厅备函,将工人代表拟在星江茶业公所开大会的情况作了汇报,呈请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核准在案,严春阳令水仙宫警察一区三分署就近派警员防范。但是工人正在开会期间,公所司事汪子文报告工人

①《婺源茶业工人公所改组》,《申报》1926年5月15日。

②《婺帮茶业公所改组委员会纪》,《申报》1926年5月23日。

③《星江茶业公所来函》,《申报》1926年5月24日。

④《茶业公所昨开代表会议》,《申报》1926年5月25日。

⑤《婺籍茶业工人之呼吁》,《申报》1926年6月9日。■

代表要策划暴动,金玉书署员当即令巡官带领警员前去调查真相,当场将工人代表吴伯超带回警署讯问,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同汪子文理论。工人代表朱润斌、俞乃庚等决定一面派人到警署交涉,一面继续开会。朱润斌报告了4月2日以来交涉的经过,并表决形成会议议案:(1)改正新章程。(2)改正新行规。(3)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4)过去每日工资3.08角,现改为每日4.58角。(5)过去每日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现改为每日上午七时上工,下午五时停工。李时蕊律师逐条解释后,全体表决通过,并公推程灶海、吴伯超、朱润斌等8人为代表,携带通过的改组星江公所章程及修正行规两项议案,于次日赴公所与董事李福田、叶开泰、臧祥亭、洪先春、程润庭等5人会商,征求他们的同意。会后,李时蕊律师和工人代表朱润斌驱车赴水仙宫警署,向金玉书署员解释清楚后,答应将人放回^①。

6月17日,8位代表前往星江公所与董事接洽。适逢公所董事及各作头正在商议应付方法,代表述明来意后,董事约定当晚八时给予答复。届时公所派出代表臧祥亭、程庆荣、俞有大等与工人代表吴伯超、程灶海、朱润斌等至闸北凤凰楼茶叙,双方切实交换了意见,吴伯超等表示立即彻查汪子文经收的敦梓堂账目,实行工人议决的改组条件:(1)公所改组应照新议决章程办理。(2)工人工资每工4.08角,经开会议决让步5分。(3)工人工作时间为每天11个小时,夜工5个小时,夜工按双倍工时计算工资。(4)工人每工抽取大洋1分捐助公所作为公益之用。(5)工人未领证书,各栈不得收留雇用,证书由徐作头出保,向公所照领,非婺源的外籍人不得给发。对以上各项条件,臧祥亭等人均口头表示同意,指出待次日午后一时正式答复后,再分别实行,但彻查汪子文一事,请暂缓一礼拜再公同举办,以免纷歧^②。

6月19日,公所司事程润庭、栈主汪礼斋等人,召集各董事、各栈主、各作头与工人代表等在小南门敦梓堂开联席会议,并邀请旅沪婺源绅商赵懋和、汪禹丞到场劝解。开会后,三方逐条讨论了工人代表所提出的改组公所章程,较原方案略有增损,然后完全通过。其次讨论修正行规,因工资问题关系重大,各栈主到场人数不多,不便当场决定,乃议定仍由公所董事程润庭分发通知,请各栈主于21日午后到公所继续讨论,再作答复。三方共同议定的星江公所章程为以下几条:一、公所由婺源茶商及工人所组织,以维持婺源茶业工人公共利益、敦睦桑梓为宗旨。二、使用茶工15名以上的茶栈,由栈主会同作头、茶工推举代表1名作为公所评议员,各茶栈推举评议员应得到该栈茶工过半数的同意。三、评议员组织评议会,选举议长1名、副议长1名,主持评议会事务,评议员过半数即可召开评议会,到会评议员过半数同意即可决议。四、评议会职权如下:(1)选举公所董事。(2)议决公所章程。(3)议决公所预算及决算。(4)议决公所财产的处分。五、评议会每年旧历五月开定期常会1次,遇有事故时,由评议长或评议员10人以上联合署名,可召集临时会议。六、公所设董事15名,管理公所财产,执行公所事务。凡在各栈充当作头的茶司均有当选资格。七、各董事分科办事,并互相推举总董及常务董事常川到公所执事。八、董事因事务需要可聘请雇员,但所用人员须过半数董事同意,处理其他重要事务时亦相同。九、公所设名誉董事10名以上,由评议会从栈主及婺源有名望的绅商中推选产生。十、评议员、董事均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十一、章程自栈主、作头及工人代表联席会议决后,呈请官厅核准施行^③。

至此,在公所董事及茶栈栈主、作头的配合下,茶业工人提出的改组公所章程的要求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得到栈主的答复,双方为此掀起了历时更久的拉锯战。

三、1926年旅沪婺源茶工要求增加工资案

1926年6月21日,婺源茶工以生活成本增高为由,再次向栈主、作头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栈

①《婺源茶业工人代表大会纪》,《申报》1926年6月16日。

②《茶工代表与董事接洽情形》,《申报》1926年6月18日。

③《婺源茶业劳资联席会议》,《申报》1926年6月21日。

主、作头、工人三方在城内星江茶业公所开会商量解决办法,一部分栈主另在租界集会,决定仅加大洋3分。工人情激愤,遂委托李时蕊律师函请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及上海县知事危道丰,要求设法维持,并传谕栈主、作头和业董三方代表到场,商量工人加资方案^①。工人提出每工增加1角,每日工资为4.08角,并附上理由书,解释茶工增加工资的原因:(1)绝大部分茶工只有半年工作,仅少数有常年工作,每年春季由婺源赶到上海,秋冬停工,仍返回原籍,往返路程有从九江经饶州、乐平者,也有从杭州经余杭、昌化者,单程至少须10天,甚至有多至20天者,平均往返要耗时1个月,既无工资,又需旅费,与其他能常年工作或居住上海本地者有很大不同。(2)在上海工作期间,栈主提供食宿,但未开工前和已完工后,或中途停工,则需工人自备伙食或自寻宿舍,耗费甚多,一日三餐都难保证。(3)因上述二种原因,平均每人每年工作6个月,照原定工价计算,每月9.24元,6个月共计55.24元,仅能支付往返川资及空闲时食宿之用,甚至尚不足以抵付,若每工仅加3分,则1个月仅能增加9角,对工人无丝毫用处。(4)每工加洋1角,虽不能使工人满意,但工作6个月,可多得洋十七、八元,能够应付往返川资,个人工资可节余下来以补贴家用^②。

茶工提出加资1角,栈主却仅同意加资3分,双方互不相让,经工人代表一再劝解,提出3分暂时作为酒钱,不算作工资,因茶市不畅,茶叶销售困难,骤然增加1角,栈主难以承担,待茶市有所转机再行加资,应不成问题^③。7月14日,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传谕茶工代表进行调解,吴伯超、程灶海等与栈主全权代表和记茶栈张发宝、福裕栈俞瑾明等到县署候示,栈主俞瑾明陈述此次茶工加资情形,并报告敦梓堂纯粹为婺源工人兴建,改组当无问题,但加资一层,负担太重。工人代表吴伯超等声称,工人生活困难,加资1角为最低限度,虽相持多日,但始终没有停工。危知事提出折中办法,在3分基础上再加2到3分,请星江茶业公所程润庭等5位董事及全体栈主考虑清楚,如同意再到县署签订协议。茶工代表向工人报告经过,全体工人表示必须加资1角,待再到县署时,向县长陈述困难^④。

虽然茶工提出必须加资1角,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最后同意了危道丰知事提出的加资方案,孰料永泰和代表汪鼎臣、福裕茶栈兼全权代表俞瑾明2人坚决不同意再加3分,并迫使工人签字承认已加资的3分。工人代表程灶海、朱润斌、吴伯超等以此次相持将近两个月,工人方面已难以维持,决定向县署及警察厅辞去代表之职,听凭官厅主持解决^⑤。工人闻讯后,认为栈主不谅解工人难处。7月17日上午,福裕、永泰和两栈工人约集各栈茶工罢工抗议^⑥。茶工罢工后,大茶栈推举工人代表2人,小茶栈推举工人1人,共200余名,由洪荫溪、王培林等人负责,向官厅请愿,提出了最低要求:(1)每工增加工资大洋1角。(2)工作时间为日工10小时,夜工5小时。(3)停工期内,工资伙食一律给发。(4)所有停工损失,责令汪鼎臣、俞瑾明照数赔偿。(5)将来开业后,各栈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上海县知事危道丰表示,一面向茶栈栈主磋商加资事宜,同时要求工人静候调停,不得有越轨行动^⑦。数天后,淞沪警察厅与上海县署发布通告,劝谕工人开工,并调解每工加资5分,劳资双方均表示遵行,各栈恢复正常,开始工作。但26日中午,忽有数十名工人分头劝说各茶栈工人罢工,并推代表程灶海、洪汝臣到茶商同业公会,提出三项条件,要求各栈主答应,才开始工作,其条件为:(1)茶商同业公会曾禀告警察厅,释放被拘留的工人代表俞乃庚及3名工友,须即日担保释放。(2)敦梓堂总董通告每工所加5分工

①《茶工代表呈请官厅办理》,《申报》1926年6月26日。

②《婺帮茶业工人要求加薪》,《申报》1926年6月28日。

③《茶业工人要求加薪之近讯》,《申报》1926年7月4日。

④《危知事调解茶工加资问题》,《申报》1926年7月15日。

⑤《茶工代表向县厅辞职》,《申报》1926年7月17日。

⑥《茶业工人昨日罢工》,《申报》1926年7月18日。

⑦《关于工潮之汇纪·茶业罢工后之县批及呈文》,《申报》1926年7月23日。■

资,须于5月13日起实行,嗣后不得中途返悔。(3)茶商同业公会致函各报,证明工人并无掳夺小孩及抢金镯银洋等事。茶商同业公会接到此项条件后,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只答应工人所提下列条件:(1)被警察厅所拘留的4名工人,由与该工人有关系的仁记、义同兴、宝兴恒、保昌四家茶栈呈请警厅保释,茶商公会不负责任。(2)此前所加3分工资于5月13日起实行,现在所加2分工资从工人上工时再算。(3)致函各报证明,由各栈自行办理。工人代表不满公会的答复,各栈主亦表示再不能让步,磋商一个多小时仍无结果,最后茶商公会推代表丁家英、钱子良、张发宝到警察厅稟诉工人不遵劝谕,仍然罢工的经过情形,要求警察厅进行保护^①。在茶工发动罢工时,唐家弄馨茂椿茶栈仍照常工作,罢工者得知消息后,于7月25日派詹子齐、洪标祥前往该茶栈阻止茶工工作,要求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栈主洪桂椿当即向巡捕房报告,詹子齐、洪标祥2人被逮捕,解往公共公廨,其后被拘押3个月^②。

7月26日晚,制茶工人又推举代表前往茶商公会,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每工自3分加至1角,栈主偿还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等。茶栈栈主接到此项条件后,决定置之不理,双方谈判至此决裂。27日上午,茶商同业公会召集紧急董事会,讨论工人提出的条件,磋商良久,认为该年茶业不振,工人不体谅栈主苦衷,议决全部停业,一面推举代表丁家英、钱子良等至警察厅、县署,当面稟告工人不遵守劝谕及要挟情形,并申诉此次损失之惨重与营业之艰难,实在无法维持,请求停业,待警察厅与县署核准后,当即通告全埠一百余家茶栈即日停业,解散各栈工人,停止供给膳宿^③。茶商及栈主代表到县署后,行政科长出面接见,婉劝代表转知各栈主不要走极端,至于工人方面,官厅自有处置办法。工人见栈主态度趋于强硬,遂于27日深夜,托人向栈主求情,栈主提出,前面开出的3项条件,栈主只允许被警察厅拘捕的工人由茶商公会负责保释,工资仍然每工加5分,如果工人平日不辍工,每百工加1元,至于登报更正则不能答应,以上2条须工人上工后方可实行。工人代表一一应允,并定于28日全部上工。28日,各栈工人均照常上工,下午茶商公会召集董事会,讨论履行答应工人的2项条件,推举代表到警察厅保释被拘留的4名人员,警察厅随即释放,28日兑现增加的工资,工人见各栈主态度诚恳,均表示满意^④。

持续两个月的工潮终于结束,茶工与茶栈都是各让一步,达成一致意见。星江茶业公所总董胡靖昀呈请淞沪警察厅令该管警区随时防范,警察厅于9月26日发布保护星江茶业公所的公告^⑤。9月27日,上海县公署也发出布告,令各茶业工人各安其位,不得私行集会,自公告发布后,倘再有纠众罢工者,一经访觉,定行拘押,严惩不贷^⑥。

四、结 语

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主要分布在茶叶的生产地徽州和销售地上海,徽州境内的茶商同业组织经历了从屯溪茶业公所到徽州茶务总会,再到休宁县茶业同业公会的演变轨迹,并且构筑起覆盖主要茶产地婺源、祁门、歙县的组织网络,其主要职能是调查徽州茶叶产量,解决商业纠纷,维护茶商利益。上海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在人员构成上比较复杂,是茶商、茶栈工头、工人的联合体,主持公所事务的是栈主与工头,举办的事务多围绕茶栈工人的公益而展开,如春、夏两季设施粥局,救济穷苦工

①《茶业工人又有问题》,《申报》1926年7月27日。

②《茶栈主控究唆使罢工》,《申报》1926年7月27日。

③《茶业工潮谈判决裂》,《申报》1926年7月28日。

④《关于工潮汇记·茶业工潮解决》,《申报》1926年7月29日。

⑤《警厅保护星江茶业公所》,《申报》1926年9月27日。

⑥《县署保护星江茶业公所》,《申报》1926年9月28日 ■

人;夏季向工人施药防痧病;为身故工人提供殓费,帮助运送棺木回到徽州原籍;以及调解栈主、工头、工人间的矛盾等。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的治理结构也经历了从董事制到委员制的演变,讲求民主决策,集体管理,强调监督限权,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变化。

1926年婺源制茶工人推动修正星江茶业公所的章程及行规是一件值得重视的案例,首先,茶业公所不仅是茶商及茶栈工头的组织,一线工人也要求参与权。以往对会馆公所的研究没有关注从业伙计的作用。把持同业公所管理大权的多是商人,他们与伙计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所以仅从公所董事层面入手可能无法全面把握对公所的认识。其次,茶工抛开星江茶业公所的理事,自发开会讨论修正章程行规,一方面可视作工人意识的觉醒,主动谋求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公所产业丰厚,每年的房产租金多在三四千元,这笔财产如何分配,引起各方的兴趣,茶工就提出要把部分租金作为工人福利,提高工人工资。但是在现有的公所管理层中,仅有茶商及茶栈作头,没有工人代表,无人为他们争取权益,所以他们极力要求修正章程,提出由栈主会同作头、茶工分别推举代表作为公所评议员。各栈推举的评议员,也应得到该栈茶工过半数的同意,同时强化评议员的职权,这是制茶工人为求在公所管理层中谋得一席之地而努力。

在茶工的努力下,上海星江茶业公所的章程得到修正,但茶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几经周转,甚至发起罢工,也未能兑现所提出的条件。与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劳资纠纷相比,这起纠纷并没有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而从资方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多少顾及同乡情面,愿意同工人进行平等对话。纠纷处理过程中,同乡和同业组织居中斡旋,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比较强调桑梓之情,提出不要伤害同乡感情,在这个大前提下,劳资双方可以就具体的条件进行协商。而从结果来看,劳资双方共同妥协,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原有的条件。研究其他类型劳资纠纷的学者多强调国民党、工人、资本家三方互动博弈的关系,而旅外徽州人的劳资纠纷更多的是劳、资与同乡组织之间的博弈,虽然政府也出面训诫谈话,发布通告,其态度也倾向于雇主方面,但最终促成事件解决的还是在同乡和同业组织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这也为我们考察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的运作提供了颇具参考作用的个案。

[参 考 文 献]

- [1] 李森堡. 同业公会研究[M]. 上海:青年书店,1947.
- [2] 彭泽益.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 吴 慧. 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3).
- [4] 彭南生. 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